

1954—2004

求真务实五十载

历史研究所同仁述往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求真务实五十载

历史研究所同仁述往

1954—200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求真务实五十载: 历史研究所同仁述往/陈祖武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10

ISBN 7-5004-4674-8

I. 求… II. 陈… III.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
历史-概况 IV. K-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1264 号

责任编辑 郭沂纹
特约编辑 李天勇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电 话 010-840294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8.75

字 数 483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邮 编 100720

传 真 010-84017153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印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插 页 6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陈祖武

今年，欣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55 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亦迎来了建所 50 周年的喜庆日子。50 年来，一代接一代的史学工作者，在历史研究所艰苦奋斗，求真务实，为新中国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甘于寂寞，鞠躬尽瘁。有幸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我们为之欣然，为之怡然。

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当初创建历史研究所的众多学术大师，都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上个世纪 60 年代中以前来所的大批专家，亦大都退出了研究工作第一线。今天，主持本所各个学科工作的多位专家，在未来的几年内，也将陆续把接力棒传递给逐渐成长起来的学术带头人。当此新老交替的关键时刻，回顾既往，瞻望前程，认真总结 50 年的艰苦奋斗历程，对于推动历史研究所的建设，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神圣使命，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我们将几代学者的有关回忆文字，稍事别择，辑录成编，既用以缅怀大师业绩，昭示本所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正确方向，亦寄寓全所同仁实事求是的执著追求。

50 年来，历史研究所每前进一步，皆得到全国史学界同仁的大力支持、爱护和帮助。历史研究所既属于我们，也属于

全国史学界。借此机会，谨向史学界的各位专家、学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日后，我们将一如既往，紧紧团结和依靠全国史学界，加强合作，促进交流，为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我国的历史学乃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而共同奋斗。



1961年1月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扩大会议合影。不分排左起：刘导生、张政烺、金灿然、贺昌群、顾颉刚、侯外庐、吴晗、白寿彝、钱宝琮、邓广铭、杨向奎、翁独健、李俨、吕振羽、熊德基、周一良、唐兰、陈垣、胡厚宣、陈乐素、范文澜、傅乐焕、尹达等先生



1961年郭沫若先生(前坐立者左9)参加《中国史稿》编写组工作会议并与参加会议的人员合影留念。坐立者:杨向奎(左2)、陈乐素(左4)、尹达(左6)、林甘泉(左11)、张泽咸(左13)等先生。站立者:宋家钰(左3)、姚家积(左7)、刘重日(左9)、朱大昀(左15)、黄烈(左16)、酆家驹(左18)、王戎笙(左19)等先生



1972年春,顾颉刚先生与参加《二十四史》校点工作者合影。前排左起:阴法鲁(左1)、唐长孺(左2)、白寿彝(左3)、顾颉刚(左5)、翁独健(左7)、陈述(左8)等先生。后排左起:周振甫(左1)、孙毓棠(左3)、王锺翰(左4)、张政烺(左5)、王毓铨(左6)、启功(左7)等先生



历史研究所1979年学术委员会成立。主要成员有(前排左起):王毓铨、白寿彝、邓广铭、侯外庐、尹达、翁独健、胡厚宣、张政烺。(后排左起):邝家驹、梁寒冰、孙毓棠、李学勤、田昌五、林英、熊德基、杨向奎、牟安世、黄烈、林甘泉等先生



1990年12月历史研究所为长期从事史学研究的本所著名专家杨向奎、王毓铨、胡厚宣、张政烺先生举行从事学术研究55周年暨杨希孜先生从事学术研究50周年纪念会。前排左起：李学勤、张政烺、胡厚宣、杨向奎、王毓铨、杨希孜、林甘泉等先生



1999年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合影。前排左起：陈祖武、陈高华、李学勤、林甘泉、卢钟锋、童超等先生。后排左起：辛德勇、丁守璞、宋镇豪、姜广辉、张弓、李斌城、余太山、商传、彭卫等先生

目 录

序	陈祖武 (1)
五十年的回忆和思考	林甘泉 (1)
郭沫若与尹达二三事	翟清福 (12)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	谢保成 (25)
郭沫若纪念馆馆名变化的由来	郭平英 (40)
在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陈 垣 (46)
陈垣先生传记	陈智超 (52)
深刻的启迪	
——回忆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	李学勤 (67)
忆侯外庐先生的育才之道	步近智 (72)
侯外庐先生与中国思想史学科建设	
——兼记我在历史所的学习和工作	卢钟锋 (83)
忆向达先生	肖良琮 (89)
缅怀尹达先生	王震中 (101)
忆尹达同志对历史地图工作的贡献	刘宗弼 (118)
怀念熊德基先生	刘 驰 (120)
在顾颉刚先生一百周年诞辰纪念会上	
的发言	杨向奎 胡厚宣 (137)
润物细无声	
——每逢春雨,我常想起顾先生	胡一雅 (142)
回忆父亲	
——顾颉刚先生整理古籍	顾 潮 (150)
顾颉刚藏书记	顾 洪 (167)

文章、风范、长者

- 怀念谢国桢先生 刘重日 (204)

读《瓜蒂庵小品》

- 纪念谢国桢师百年诞辰 商 传 (209)

《瓜蒂庵书目》与《刚主题跋》

- 谢国桢先生藏书概览 杨志清 (220)

沈从文先生带我走进充实难忘的人生 王亚蓉 (234)

贺昌群先生印象记 肖良琼 (252)

难忘四年

- 缅怀吴晗先生 张显清 (265)

基础扎实 成效显著

- 记杨向奎先生的施政及其成效 周远廉 (273)

风范长存

- 悼念杨向奎先生 何龄修 (280)

回忆进所初期杨向老对我的培养 郭松义 (290)

怀念王毓铨先生 王春瑜 (297)

悼念著名明史专家王毓铨先生 王曾瑜 (301)

醉中有高山流水

- 《孙毓棠诗集》编后记 余太山 (305)

记著名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 宋镇豪 (311)

传经还望君

- 记胡厚宣先生 王宇信 (323)

张政烺先生访问记 陈智超 (333)

我所认识的张政烺师 王曾瑜 (345)

启人心智 催人奋进

- 《张政烺文史论集》编辑前后 张永山 (353)

我们永远记着他

- 杨希枚先生 陈绍棣 (358)

此心今已许天山

- 马雍《西域史地文物丛考》编后记 余太山 (376)
- 《兰园大庭脩自用印集》序 李学勤 (382)

哲人风范长存

- 回忆几位已故的史学家 陈高华 (384)
- 关爱与奋进 张泽咸 (398)
- 温馨的学术家园 李斌城 (404)
- 所谓“黄埔一期” 黄正建 (410)
- 关于分党组 李经元 (417)

集体智慧的结晶

- 《甲骨文合集》 孟世凯 (420)
- 甲骨学殷商史学科 宋镇豪 (436)

栉风沐雨 成就斐然

- 50年来历史所简帛研究回顾 谢桂华 (445)
- 《英藏敦煌文献》编辑、出版始末 宋家钰 (463)

泪眼亲瞻怜落寞 暂接倩影慰故园

- 关于《英藏敦煌文献》的回忆 张 弓 (487)
- 徽学兴起亲历记 栾成显 (499)
- 历史地理组的成立与任务 陈可畏 邓自欣 (511)
- 《中国史研究》创刊纪事 李祖德 (522)
- 历史研究所与中国史学会 童 超 (541)
- 历史所史学先辈与《二十四史》的整理 吴树平 (556)
- 对长沙会议和古代史“六五”规划的一

- 些回忆 周年昌 (566)
- 回顾《中国历史大辞典》的编纂历程 李世愉 (573)
- 从档案看历史所的初建和发展 刘荣军 (586)
- 后记 编 者 (594)

五十年的回忆和思考

林甘泉

2004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建所50周年。1994年纪念建所40周年时，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四十年的回顾》（载《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就自己在历史所40年工作的感受，谈了几点意见，主要涉及四个问题：（一）关于研究所的基本任务；（二）关于集体协作；（三）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四）关于保持原有的研究优势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转眼之间，又过了10年。在纪念建所50周年之际，所内同仁纷纷撰文共叙衷情。50周年是大庆，作为建所初期到所而尚幸存的一名工作人员，我似乎没有理由不再握笔写几句话。有些话不免是10年前那篇小文的重复，但星移斗转，无论是国内、院内或所内，这十年间形势都有不少变化。新的形势会触发一些新的思考，也是很自然的。

《庄子·养生主》说：“指（脂）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学术的传承也如同薪尽而火传一样，烛薪的燃烧是有穷尽的，但已经点燃的火却会传续下去。当我们庆贺历史所建所50周年时，不能不怀着深深的敬意，想念那些在建所初期点燃起学术薪火的前辈学者。历史一、二、三所是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成立的，中央指派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兼任历

史一所所长，北京师范大学陈垣校长兼任历史二所所长，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改为历史三所，所长范文澜。近代史研究所前身是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有一定基础，而一、二所则属新组建，无论是研究人员或图书资料都完全是白手起家，十分困难。在1959年两所合并之前，一、二所虽然挂两个牌子，但党政工作实际上是统一的，一个党支部，一个行政办公室。一所的日常工作由尹达副所长主持，二所的日常工作由侯外庐副所长主持。向达先生兼任二所副所长，他的人事关系虽然仍在北京大学，但也经常兼顾二所业务工作的领导。在中央有关领导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顾颉刚、杨向奎、胡厚宣、张政烺、贺昌群、王毓铨、谢国桢等著名史学家相继由高等学校和其他单位调来历史所（孙毓棠先生后从经济所调来）。据我所知，当时拟调来所的还有几位著名学者。但高教部的领导认为这样一来会大大削弱高校历史系的教学力量，向中宣部的领导同志提了意见，结果从高校继续调人的安排就此打住。后来历史一、二所采取聘请兼职研究员和副研究员的办法，又特邀一批著名史学家如蒙文通、唐长孺、谭其骧、白寿彝、翁独健、韩国磐、李埏、邱汉生等参加所的研究工作和指导青年同志。白寿彝和翁独健两位先生还一度担任历史所研究室的主任。正是由于有一批享有盛誉的前辈学者作为专任研究员和兼任研究员，才使得历史所建所以后能够比较顺利地开展研究工作，而陆续分配来所的青年同志也得以在一种良好的学术氛围中成长。

历史一、二所合并以后，所长仍由郭沫若兼任，尹达、侯外庐、熊德基任副所长（以后又增加东光和白天同志）。历史研究所作为国家的科研机构，基本任务应该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培养高水平的历史学者。这一点，历史所的领导班子从一开始还是有所认识的。来所较

久的同志都知道，尹达同志曾多次提出研究所的任务是出产品、出人才。外庐同志曾对“任务带学科”的提法表示不同的意见，认为这种提法会削弱历史学科的基础研究。针对当时上面布置下来的有些干扰正常研究秩序的非学术性任务，他甚至在党委会上提出过“我们敢不敢顶回去”的意见。但是在当时政治运动不断的压力下，所领导不但未能集中精力开展科研工作，还得经常检查自己跟不上形势的“右倾”思想。在我的记忆中，自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正常的研究秩序基本上就被打乱，只有在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中央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并批转“科学十四条”意见之后，研究所才得以有较多的时间用于开展科研工作。历史所的老同志都会记得，那三年虽然大家的生活十分艰苦，却是用功读书的黄金时期，同志们始终保持着精神饱满的状态。可惜好景不长，随着经济调整工作取得一定成效，“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又重新抬头。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历史所也就陷入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之中了。

“文化大革命”中，哲学社会科学部是一个重灾区，历史所也未能幸免。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历史所的工作得以重新走上轨道。侯外庐、尹达同志恢复了工作，梁寒冰、马健民、吴友文同志也先后被派到历史所加强领导班子。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历史所的各项工作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老一辈专家焕发了学术青春，笔耕不辍。“文化大革命”前来所的青年同志这时都已步入中年，他们当中一些人已有不少科研成果问世，有的在相关研究领域中还享有较高的知名度。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立之后，历史所基本上不再接收大学本科生，而是从研究生中补充新鲜血液。但由于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经费是从社科院总经费的“蛋

糕”中分切的，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名额受到一定限制，结果使我院无法像高等院校那样从硕士生和博士生中多选拔一些人才充实研究队伍。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所从历届毕业的研究生中还是尽可能多留下一些同志分配到各研究室工作。随后还从若干高等学校吸收少数博士生来所。这些同志今天都已成为历史所各研究室的骨干力量。

历史所 50 年的历史，是和新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历史分不开的。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是整个史学界成绩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历史学所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以及它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也在历史所这 50 年的历史中有所反映。历史所的老专家和青年学者，曾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热门课题“五朵金花”讨论的积极参与者。而讨论中出现的某些缺点，诸如把中国古代社会的阶级关系简单化、公式化，以及拔高古代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革命性等等，也在我所同志的一些论著中出现过。无论是“文化大革命”前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或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儒评法”，历史所也都有同志跟着“左”倾指导思想犯了错误。50 年的风风雨雨，成绩值得我们珍惜，而缺点和错误需要我们铭记并引为教训。“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和全国的史学工作者一道，经过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教育，又有了一个相当宽松的环境来专心从事研究工作，从而大大激发了大家钻研业务的积极性。全所人员在新时期中出版和发表的专著、论文、工具书、资料 and 译著数量之多，是“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时期所不敢想像的。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人文学科，但它也和其他学科一样，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最近，《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提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科教兴国战

略包括繁荣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意见》还强调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这使我联想起最近几年在史学界有一股力图淡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思潮，也使我回忆起历史所老一辈学者值得我们学习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在历史所工作 50 年，我所接触的前辈学者给我留下了两点很深刻的印象，一是他们严谨扎实的治学精神，二是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烈愿望。他们并不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会妨碍自己严谨扎实的治学精神。相反，从他们五六十年代的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到，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使他们开拓了自己的历史视野，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比先前深入了。杨向奎先生还在山东大学任教时，就很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调来历史一所后，他组织青年同志学习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用来指导古代史的研究。50 年代国家民委组织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形态调查时，向奎同志不仅组织历史一所的青年同志参加，还亲赴少数民族地区参加调查。一、二所合并以后，他一度担任明清史室主任，主持孔府档案和乾隆刑科题本的整理，目的也在于了解明清时期的阶级关系和剥削形态。贺昌群先生原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南京刚解放时，他为了潜心阅读马列经典著作，特地移居城外一段时间，闭门谢客。他调到历史所后，仍孜孜不倦地阅读经典著作。从他的专著《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经典著作钻研的用功之深。王毓铨先生是较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者，他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特点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他在《中国历史上农民的身份》写作提纲中说：“自周秦以来，中国社会是一个在同一个帝王同一个官僚机构统治之下的具有